

欧洲共产主义

—— 第三条道路

第四集

福建师范大学政教系资料室 编

第四集

欧洲共产主义

第

二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路

福建师范大学政教系资料室 编

重 印 说 明

我们利用“欧洲共产主义”系列资料集的重印之机，为各集加上“第三条道路”这一付题，以适应“欧共”研究的现状。

各集重印均有修改和补充。在本集中，我们增印《时不我待——我们的国家正处在历史的转折时刻》（西方谓之《列宁格勒提纲》）一文，供读者参考。

“欧共”资料集的重印，承蒙于各兄弟单位的鼓励和支持，在工作中我们将引以为自责和鞭策，以期不断提高编纂水平和质量。

一九八四年三月

编者说明

本集和第五集均围绕“欧洲共产主义——东方”（西方报刊对苏联东欧各国或华沙条约参加国的简称）的专题编纂而成。

“欧洲共产主义——东方”，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专题。

西方一些研究苏联东欧问题的专家和学者认为，苏联和东欧的某些决策者害怕欧洲共产主义及其它对本国的影响，远甚过于西方，尤其在七六年欧洲党会议以来，欧洲共产主义在东方的影响增长了，这在捷、波和东德的表现最为明显，以致这些国家的首都尽管可以出售某些西方资产阶级报刊，却禁止出售西共、意共和法共的党的机关报，特别在两者冲突最激烈的时期更是如此。

再从西欧共产党本身来看，他们对苏联东欧各国的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反应是非常谨慎的，而且有着强烈的选择性，他们一旦受到苏联的压力，又往往形成内部分歧，七七年三月意法西三党会谈就说明了这一点。西方为了对付苏联，常常公开揭露苏联国内残踏人权的情况，逼迫西欧各党表态，有时也颇使他们为难。

近年来，西欧信奉欧洲共产主义的各党对苏联东欧各国“现实社会主义”的批判日渐强烈，并认为这种批判是产生欧洲共产主义的重要政治根源之一。但是，欧洲共产主义的这种挑战是有限度的，除非有重大事件（例如苏联入侵波兰）发生，他们是不会与苏联断绝关系的。

我党已与意共、西共、希共（国内派）和委内瑞拉争取社会主义运动恢复了党际关系，但关系正常化并不等于我们完全赞同他们的观点。故本集及第五集选编的材料，相信读者自有鉴别能力，无须编者拙言。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

第四集重印说明

编者说明

东欧、欧洲共产主义与中国.....

.....〔西德〕曼弗雷德·摩尔干施特恩(1)

东欧、欧洲共产主义和缓和问题...〔美〕佩维尔·麦卡拉(7)

欧洲共产主义和东欧.....〔美〕吉里·瓦伦塔(35)

苏联的反对派.....〔英〕迈克尔·斯卡梅尔(47)

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改革和“布拉格之春”.....

.....〔捷〕奥塔·希克(66)

《抉择》序言.....〔东德〕鲁道夫·巴罗(76)

寄语西方.....〔苏〕安·萨哈罗夫(84)

时不我待——我们的国家正处在历史的转折时刻.....(97)

捷克斯洛伐克“七七宪章”宣言.....(131)

关于国家状况及其改良途径的报告.....

.....〔波〕“经验与未来”小组(137)

出路何在?.....〔波〕“经验与未来”小组(150)

波兰“自由、正义、独立自治共和国俱乐部”成立宣言...(184)

东德反对派宣言.....(190)

苏联东欧持不同政见运动简介.....本室编(210)

· 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运动.....(211)

· 捷克的“七七宪章”人权运动.....(221)

· 波兰的“经验与未来”小组.....(224)

· 波兰的“自治共和国俱乐部”.....(225)

论著及有关资料介绍.....本室编(226)

“欧洲共产主义”人物志之二.....本室编(233)

· 奥塔·希克

· 罗·麦德维杰夫

· 鲁道夫·巴罗

补 白 (五 则)

匈牙利出版为纳吉翻案的著作.....(183)

一项研究“布拉格之春”的计划.....(203)

波社会自卫委员会正式宣布解散.....(209)

《让历史来审判》及其续篇简介.....(130)

《“布拉格之春”前后》简介.....(96)

东欧、欧洲共产主义与中国

〔西德〕曼弗雷德·摩尔干施特恩

本文是吉利·贝利康七九年年底访华后接受作者采访时的谈话。作者系西德《新中国》杂志编辑。

—— 编 者

问：贝利康先生，您去年访问中国，是作为一位共产党代表还是作为一位政府代表，是作为一位捷克反对派和欧洲议会议员还是作为一位与意共有联系的欧洲共产主义者？

答：幸好我们中国朋友不是教条的；他们还比欧洲人一般想象的要灵活。似乎难以确切说出，我是作为哪种身份被他们邀请的。可以说，我是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的一位老朋友被邀请的。当我还置身学生运动的时候，我就积极投入了支持1949年胜利前的中国革命运动。作为国际学联主席，我首次在1956年访问过中国。后来中断20年。现在我们恢复了接触并被他们邀请。他们对所有关于捷克、意大利和欧洲的各种问题都很感兴趣。我一直感觉，你能够同他们十分坦率地讨论问题，即使你有不同意见的时候也勿须顾虑会触犯什么协议。当然，这种气氛在苏联和其他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决不可能出现的。

问：中国对待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态度是一分为二的。一方面，他们批判苏联的入侵，并首次用了“社会帝国主义”一词来刻画苏联；另一方面，他们又把“布拉格之春”的改革政策看做是一个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演变”。如何看待中国对1968年的布拉格的态度？

答：是的，一方面，中国毫不含糊地批判了苏联的入侵，并反对苏联的帝国主义行径，周恩来1968年8月23日在北京发表谈话要求苏军撤走，以后又反复多次重申。当时，中国谈到了“大”“小”修正主义者之间的斗争。“小”修正主义者指杜布切克和捷共。这种状况是同当时中国的文化革命有关联的。当时，中国面临大量问题。它本身同世界隔绝了，并不真正了解在捷克斯洛伐克所发生的一切。当时，我们对在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也不甚了了。我们对文化革命持保留态度，并且完全不了解它。由于这个原故，我们所想象的中国国内疑问是会影响到中国支持我们摆脱苏联争取自主的努力的。我们双方都彼此缺乏了解。这种状况后来有所改善。现在我可以肯定，中国今天对1968年整个事件发展的看法是会完全不同的。这次，他们询问了我有关这方面的大量情况，也查阅了有关方面的大量文件。有些人也问过我，中国对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意见。中国人说，根据他们官方的观点，这是一个反革命事件。但是，今天他们自己也提出了这么一些问题，当时匈牙利的问题是否就不同于今天匈牙利的问题，纳吉是否首先在于力图摆脱苏联的霸权控制而争取独立。这些问题现正在讨论中。我们应当向他们提供材料，帮助我们的中国朋友了解情况，并在我们的访问中共同探讨这类问题。同时，我们本身对文化革命期间在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也很感兴趣，包括流行的各式各样的神话，只有了解真情才能帮助

我们改进看法。

问：当前中国经济学家正在讨论一些有关他们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在这方面，他们明显地倾向于效法东欧的经济改革。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访问过中国，奥塔·西克已被邀请。您认为在北京也会出现一个“布拉格之春”吗？您的中国朋友对“布拉格之春”有新的评论吗？

答：中国人对1968年在捷克，还有在波兰和在匈牙利发生的改革运动，当然很感兴趣。他们也对奥塔·西克，吉里·科斯塔以及其他捷克经济学家的著作很感兴趣。我希望别的经济学家也将访华去同我们的中国朋友共同探讨。我认为，他们决不会采取捷克的改革模式，因为两国有着完全不同的经济结构、传统和情况。今天，中国人正在研究各种经验，包括南斯拉夫经验、西方经验甚至台湾经验。同时，他们也反复强调中国的问题必须按中国式的办法解决。他们感兴趣的不仅有经济问题，也有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工人、农民和公民参加社会主义国家的管理和行使权力的问题，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与苏联和美国的关系问题。这种兴趣是很可佩的。但是，中国人不愿一切照搬，也不愿后退，他们正结合中国情况在寻找新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问：似乎可以认为中国已经有了支持东欧社会主义反对派的意见。他们把苏联作为霸权主义者加以批判，并赞成拆散华约国家。您认为原因何在？中国的这种态度是否有利于东欧社会主义反对派？

答：他们确是如此，还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出于教条的理由。按照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是属于所谓的第二世界，是他们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和两个超级大国中的潜在的同盟者。当然，我也向中国朋友阐明了我的观点，他们是不能把

那些在国内得不到支持的统治者当做潜在的同盟者的，诸如捷克斯洛伐克的胡萨克和比拉克、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东德的昂纳克，这些人还同苏联结有最亲密的联盟。波兰和匈牙利的情况也许好点，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对苏联的态度是很鲜明的。今天，南斯拉夫是中国的盟友。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排除这个可能，在当前的经济危机中，苏联终会变得无力满足东欧国家在原料和能源上的需要量，这些国家如果摆脱困境，只得被迫倒向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我认为，我们朋友所想到的在同苏联霸权主义斗争中的天然同盟者，一定是东欧各国的民主派，特别是东欧社会主义反对派。当然，这也取决于中国的国内情势。如果中国人承认东欧社会主义反对派是他们的真正伙伴，他们就得容忍自己国内的意见不同的人。我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一问题的。先决条件是双方得相互增进了解和消除偏见。现在中国正在准备大量翻印东欧的出版物，他们正积极进行接触，并有可能导致合作。当然，我个人是愿意看到这种形势的发展的。

问：你认为未来有无可能在中国、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东欧社会主义反对派之间结成思想上的或政治上的联盟？

答：中国人正致力于建立一个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和两个超级大国互惠主义中的最广泛的国外联盟。这个联盟首先是找象罗马尼亚或南斯拉夫这样的有独立地位的社会主义国家，再就是找第三世界国家和某些资本主义国家。据我看，东欧的民主派也可能被找到。

问：华国锋在访问意大利期间的一次官方欢迎会上也会见了贝林格，您认为在意共不准备迎合中国人而批评苏联的情况下，中共和意共有无恢复两党关系或接触的可能？

答：事实本身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贝林格访华的日程安排即

够同中共建立起良好关系的了，尽管两党在对苏问题上观点不一致，我把这件事是看做一个重要的积极的发展。直到去年，还主要是右翼政治家应邀访华，因他们反对苏联。一年前，以总书记贝蒂诺·克拉克西为首的意大利社会党的应邀才改变了这种状况。接着有阿斯卡拉特率领的西班牙代表团和现在的贝林格的访华。我相信，这种状况还会有进一步的发展，当然象迄今仍只同苏联联系的法共这样的党可能除外。从这，你可以看出中共在回到国际共运舞台的动向。这点很重要，这会有助于加快在国际共运中今天特别需要的消除分歧的进程。

问：在中国，关于民主问题存在明显的尖锐分歧。近来似乎把不同意见的发表是限制在一定范围，而非完全可以公开讨论。1968年在布拉格也讨论过社会主义和民主问题，你认为当前中国这种状况的背景是什么？

答：关于民主化问题的分歧已经不是秘密，我认为这些分歧都是带积极性的。不象苏共和东欧国家，在中国还容许讨论这类问题。这种讨论看来将继续一个长的时间。我认为，这问题是关系到如何成功地实现现代化。有那么一种倾向，我姑名之为斯大林主义者，主张用高度集中统一的政治权力和经济计划、集中一切资金和不遗余力，主张用强硬的纪律施于党内和人民群众内部而限制自由讨论的办法去加快实现现代化。但是，也有这么一种倾向，认为用如此简单的办法去实现现代化是不可能的，自然我本人是赞赏这种倾向的。访华期间，我发表意见是完全公开的，在很多场合我都这么讲，不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性，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这正象不可能一切都是由国外输入一样。如果制度民主化，全体中国公民都能更安分地行使管理的权力，现代化就能实现。据

我看，头一种倾向现是在某种程度内流行着，至少在主张严格纪律方面是如此，但也不是象在苏联那样地完全盛行。当然，这也要考虑中国的一些客观情况。民主化的过程是在中国这么一个很特殊的情况下去实现的。一方面有来自苏联经济上的和军事上的威胁，企图从南北两面（在南面以越南充当助手）包围中国。再一方面也有来自下边的干扰，来自受文化革命遗毒影响的那些人的干扰。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自毛泽东和周恩来逝世以来在中国不复再有那么一个伟大的精神权威足以能够控制动荡的局势。基于这些理由，在中国也就有人认为不宜搞民主化，我同意这一点，在中国的情况下，不宜效法1968年的捷克、中、捷两国的幅员和传统都完全不同。中国的民主化过程不得不是渐进的和在党和国家的控制下去实现的。但同时我认为，应在领域和地区方面逐步放宽，以利于群众首创精神的发扬。

还难预料这类讨论的结果。我们希望的是这类讨论不致遭受压抑，在中国能真正找到一条途径，不仅能把它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而且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和民主的国家，生活水平稳步上升和公民都拥有高度精神文明的国家。

（刘丰名译自英国《今日中国》1980年
9—10月第92期）

东欧、欧洲共产主义和缓和问题

〔美〕佩维尔·麦卡拉

(摘要)

作者生于捷克斯洛伐克，曾在布拉格查理大学经济学院从事研究工作，现在美国阿默斯特大学政治系任助理教授。

—— 编 者

七十年代的东欧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东欧的形势。为了评价“欧洲共产主义”对东欧的影响，把集团内部的不稳定同单个国家内部的不稳定区分开来是有益的。由于这个地区的稳定程度因国而异，因此，有必要分析各个国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中的关键因素。具体地说，我将通过调查各个政权国内合法性的来源和程度，各个政权上层领导的和协程度，各个政权推行的经济政策的特点以及每一个国家存在的社会压力的类型和程度，来评价“欧洲共产主义”对各国内部和集团内部的不稳定的影响。

许多西方分析家都认为，由于实现现代化，东欧精通社会经济的上层人物的活动增强了，这可能造成政治上的不稳定，而这种不

稳定最终可能导致这些国家内部的自由化和民主化，也可能导致针对苏联而实现进一步的自主。然而，我认为，技术专家和政治权贵间出现任何紧张关系至多可能导致党内权力关系的变化，因为，说起来也奇怪，今天的专家治国论者已成为重大政治变革的障碍。他们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总的来说还未使他们采用自由主义的政治准则。他们只是在经济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事实上，专家治国论者的要求和自由主义准则之间显然存在着成反比的关系。专家治国论者关心的是高效率的生产和个人消费品分配的不均衡。应当认识到，为达到这些目的而采取最有效手段往往受到自由化势力的反对，因为在人民并不具有民主传统的东欧，高效率并不一定就是要实行自由主义的政治改革。事实上，专家治国论者是把本国政府作为自己的经济利益的保护者而给予默默支持的，这样，他们就不愿意反对现存的政治制度。因此，他们都倾向于固守现状。由于这一点，我们可以说，他们不仅不支持“欧洲共产主义”，而且倒不如说他们对于“欧洲共产主义”漠不关心，或者是抱有敌意。

如果说精通社会经济的上层人物在政治上是否支持本国政府，取决于本国政府是否有能力确保他们的物质利益得到满足，那么，东欧国家的工人阶级的情况也可以说是这样。工人把就业保证和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看得比一大堆公民自由还重要得多。就是对经济改革的某些自由主义措施，工人也抱有痛快地表现出来的强烈的保留态度。例如，他们坚持要实行工资平等化，反对实行把收入分配同工作成绩联系起来的任何改革。

从这样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东欧人过度热爱福利国家，只要东欧政权能成功地实现经济增长并满足中产阶级和工人对消费品的需求，它们就能够维持自己的政治稳定。东德和匈牙利的领导人在六

十年代中期就认识到这个事实。同样，亚·杜布切克以后的捷克领导人断定他们的主要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市场困难”，因此，在杜布切克以后就把发展经济和提高生活水平作为他们实行的“正常化”政策的基本成份。一九七〇年波兰发生的事件就足以加强东欧普遍存在的把消费主义纳入国内政策基础的这种倾向。一九七一年以来，波兰政府的政策事实上就是要促进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提高生活水平，认为这样才会稳定局势。最后，大概是从一九七二年以来，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领导人就一直关心工资水平的提高和增加本国市场上的消费品的花色品种。

最近才确定的这种关心反过来又得到了非常具体的表现。东德的生活水平本来在东欧已是首屈一指的，但在七十年代又比以往提高得更快。在匈牙利，即使一九七六年的物价上涨可能会在它的身上投下阴影，但它自一九六八年以来，个人收入仍以百分之六左右的年平均率增长。在捷克，自一九七〇年以来，工资年度增长率始终保持在百分之六至百分之八之间，而商品零售价格一直是稳定的。在波兰，提高生活水平的应急计划导致了工资自一九七二年以来每年提高百分之八，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一九六一年至一九七〇年间个人收入平均每年只提高百分之一·八。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虽然仍远远落在其它东欧国家的后面，但按人口计算的平均收入仍以同样的百分比提高。总之，这些事态发展表明，东欧目前的政治权贵认为，良好的生活条件任何时候都可以安抚工人，削弱中产阶级要求革新制度的压力和孤立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

实际情况确实在很大程度是这样的，除推行新经济体制（它从根本上背离了苏联的经济管理形式）的匈牙利外，目前东欧的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是在没有进行重大经济改革的情况下实现

的。相反，所有这些政府都从六十年代推行的经济权力下放后退并且回到管理经济的方向上去。“布拉格之春”的教训对这个决定起了作用。在捷克，六十年代中期的经济改革助长了争取“现代多、元化民主制度”的要求。从捷克的经验看来，人们几乎不会感到惊奇的是，东欧的领导人已下决心使经济改革不致于为政治多元化敞开大门从而威胁“党的领导作用”。

一九七〇年和一九七六年在波兰发生的事件得到了妥善处理，以致未产生捷克式的政治后果。波兰经济的核心部分仍然是由中央来计划，重点放在经济发展的应急计划上面，目的是要迅速扩大国民经济的基础以便提高生活水平。虽然也有一些分权的做法，但这种分权的范围并未发展到单个的工厂而是扩展到大型的经济单位，这些单位在决定投资和工资等方面的责任大大加强了；在捷克和东德的经济中也存在着类似的生产关系。

如果说东欧国家在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五年间推行的“消费共产主义”取得的短期成功是无可辩驳的，那么，这种成功的取得也并不是无条件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在东德是靠提高生产率，在捷克是通过扩大从其它东欧国家的进口并承担巨额的贸易逆差，在波兰和罗马尼亚是通过从西方大量借贷，在保加利亚则是通过苏联的财政援助。与此同时，实行巨额投资和迅速提高工资的政策一方面已经给这些国家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的压力，另一方面也使消费者的期待越来越大。在波兰，这种情况尤其严重。虽然应急经济计划在过去五年中使工资足足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但这又使消费品供应枯竭：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往往产生严重的通货膨胀现象，在“受控制的”经济中则往往产生商品奇缺现象。为了对付这种短缺，波兰政府于一九七六年七月大幅度提高许多基本消费品的价格，从

而造成了工人罢工和骚动。甚至在匈牙利，虽然那里实行的新经济体制在生产消费品方面大体上取得了成效，但是某些可能对该政权的稳定造成潜在威胁的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以经济权力下放和依靠市场手段为主要内容的新经济体制不仅造成了一些单纯的经济问题，诸如投资“过热”和通货膨胀（如一九七六年为百分之十）而且也造成工人和中产阶级之间在收入上的很大的不平等。自一九七二年以来，匈牙利政府一直设法安抚工人，宣称工人的生活水平将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得到相应的提高。

其它东欧政权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现有的一切资料表明，这些国家的经济在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五年间搞得相当不错，但近来已经显露出持久性衰退的迹象。一九七六年的严重干旱使波兰，东德和捷克的农业大大减产。此外，除了在一九六八年事件后难于从西方借款的捷克外，东欧国家到一九七七年为止已对西方金融机构积欠了令人吃惊的债务——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分别为二十八亿美元。匈牙利为三十三亿美元，东德为六十亿美元，波兰为一百〇八亿美元。而且上述这些债务还在继续增加。例如，波兰的债务预计到一九七八年底将达到一百一十亿至一百二十亿美元。当前，这些国家都面临着偿还这些贷款的压力，但它们难于在西方推销自己的产品，因此无法轻而易举地偿还债务。推销产品所以困难，部分是由于出现了衰退，部分是由于东欧制造的产品已逐渐过时。它们的许多工业仍然是陈旧的，效率也低。如果要使它们的工业品（包括消费品和机床）在西方变得有竞争能力，这些产品就必须加以改进。这就要进一步吸收西方的贷款和技术，而这样做不仅要取决于东欧国家同西方的政治关系，而且也要取决于是否值得对它们提供信贷。

除了不满的工人、不听话的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集团（如天主